

Andun 安顿作品集

喧嚣

寂寞

de

当代中国人情感口述实录

DANG DAI ZHONG GUO REN QING GAN KOU SHU SHI LU



## 绝对隐私

- 用我的心牵你的手 ..... 1
- 你是我心底深刻的烙印 ..... 8
- 最纯洁的良心债 ..... 19
- 心态的解体 ..... 30
- 青春停不下来 ..... 35
- 爱在别乡的季节 ..... 43
- 折腾不起的婚姻 ..... 53
- 人的肩膀太神了 ..... 63
- 没法说服自己去结婚 ..... 72
- 惧怕婚姻的女人 ..... 81
- 总是错误地开始和结束 ..... 94
- 抹不掉留在心口的伤痕 ..... 107
- 生活是一把伤人的慢刀 ..... 117
- 天地之间孤独的孩子 ..... 130
- 故事讲完才好结婚 ..... 146
- 那种受欺骗的感觉 ..... 159
- 我是一个没有钱的女人 ..... 171
- 渴求一份真爱的感觉 ..... 184
- 从女人那里学习懂事 ..... 202
- 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 214

## 回 家

- 最后停泊的地方 ..... 226
- 快乐是我的面具 ..... 232
- 快乐不是一辈子的面具 ..... 243
- 特别懂事的孩子 ..... 256
- 你的肩是我一生的天 ..... 271
- 别人眼中的幸福不是我的 ..... 284
- 好的婚姻也有点孤独 ..... 295
- 用后半生做一份结婚证 ..... 308
- 天经地义的奉献 ..... 320
- 只不过想找到一个稳定的家 ..... 329
- 选择的结果依然是失去 ..... 351
- 重情不重理的地方 ..... 371
- 走不出那个命运的螺旋 ..... 391
- 其实只想一个开心的好人 ..... 404

## 情 证 今 生

- 一刹那的天长地久 ..... 414
- 幸福从邪恶中穿行 ..... 421
- 天上人间的握手 ..... 440
- 你是我今生最长久的守候 ..... 450
- 拥有那段属于自己的光阴 ..... 464
- 一个人心里的阳光 ..... 476
- 爱在网络蔓延时 ..... 489

青春道路上的挽歌 .....	503
岁月流逝中的永恒 .....	521
高天远水牵系无限柔情 .....	540
我们过去的好时光 .....	555
想念你在每一个地方 .....	573
男人的纯真季节 .....	586
两代女人的传奇 .....	607





最喜欢的一部电影是里察·基尔主演的《激情交叉点》。总是不能忘记那个结尾：丈夫因为车祸匆忙谢世，妻子握着他写给情人的绝交信，在他生命的终点她终于获得了完整的他；情人听到的最后声音是他在录音电话里说他权衡再三依然不能放弃她，她以为她从此就会拥有这个男人。两个为了不同的原因而欣慰的女人在医院门口相遇，悲伤的妻子撕碎了信，伤心的情人没有讲明自己其实已经得到了承诺。她们相视而后各自离去，带着只属于自己的满足和遗憾。

这样一个故事的结尾几乎使我相信了生命中可能出现的一种状态——有时候是在自己或者他人的谎言之中获得自己定义的所谓幸福的，而在别人看来那未必可以称得上幸福，正如自己认定的痛苦很有可能是别人眼中奢侈的无病呻吟。我相信事物本身只具有一种色彩，同时我也相信同一种色彩反映在不同的眼睛之中就会千差万别，我认为这种差别是一个人区别于另一个人的最主要的特征。

走进我的录音带并最终走进这本书的就是这样一个有着明显的区别于其他人群的特征的群体。他们用最富有个人特征的语言和叙述方式来讲述他们完全个人化的隐秘故事。他们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一个完全相同的意思，那就是在没有遇到我之前，所有这一切沉寂在他们心灵中的一个幽暗的角落，那里很像一个人不为人知的暗室，在孤寂的夜晚或者一个

风雨如晦的日子，他们自己——仅仅是自己——缓缓地走入其中，在那里抚摸一段经历、一种创痛，回复一段甘苦自知的燃情岁月，那是他们痛苦的根源，也是他们曾经幸福的纪念。他们希望自己忘怀的同时又希望自己牢记，他们希望有人知道自己曾经真诚又害怕别人嘲笑今天的失去……所有的情绪都是不确定的，所有的愿望都是含蓄的。他们希望有一个人的一双手和一对耳朵以及一颗富于同情的人能够倾听他们，倾听之后能够告诉他们：我替你收藏了记忆，请你从我这里开始新的生活。

我很荣幸充当了一个这样的角色。

我的受访者年龄不一、职业各异。他们通常是通过一个BP机或者电话号码找到我，他们问的是同一个问题——怎样成为一个受访者？

最初我感到非常吃惊，因为在我的采访中从来没有遇到过通常意义上的那种“好夫妻”。我在《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末》的第10版“人在旅途”主持的“口述实录”专栏从来没有记录下一对和睦的、至今还有希望白头偕老的夫妻，从来没有记录下一对能够彼此忠贞不渝的恋人。所有的故事都是悲伤的、破碎的，所有的情节都比那些生生死死的戏剧更充满着生生死死，更令人扼腕唏嘘。后来我的一个受访者用他自己的经验道出了原委：“来找你是因为你肯坐下来听我说说我自己，而我周围的人是不愿意这么做的，或者即使他愿意听我也不想说，距离太近的人反而不能互相了解。你的好处是和我没有利益关系，我知道你不会也没有必要用这些来害我。我就是因为不如意才找你说。”他的话让我想起老托尔斯泰说过的那句被人引用滥了的话——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曾经不止一次在电话中听见初次通话的人抑制不住哭泣，在我还是一个真正的局外人、一个完全的不知情者的时候，他们因为看我的专栏之后凭着对我这个人的直觉而把最真实的情绪流露在我的对他们来说尚属陌生的耳边。每日这个时候，我的心都会缩紧了，陷入一种莫名的疼痛之中。每当这个时候，我都必须告诉我自己，我首先是一名记者、一名社会工作者，其次才是一个被无数人命名为“脆弱”的女人。但是，几乎每一次，也许是出于性别，也许是出于善良，同情心总是走在理智的前面，总是在没有来得及作出任何判断之前就已经开始表示谅解。我

一直认为，我同情和谅解的不是一个陌生的、正在伤心的男人或者女人，而是在这个繁华热闹、人声鼎沸的社会里的一颗孤独的、渴望交流的、敏感的心灵。

在每一次来访之前，我会不厌其烦地告诉我的受访者：“你一定要呈现给我一个完整的事实，那应该没有经过你自己剪接的事实。你可以用你认为最合适、最方便的语言来叙述。你可以不回避人名、地名和可能出现的工作单位以及一些只有当事人才能认出的特殊细节。当录音结束的时候，你可以告诉我哪些是可以整理成文的，哪些是需要隐去的。你可以为你自己选一个你喜欢的名字用在我的文章里。你来找我说明你是信任我的。我可以做到的是保护你和你提到的每一个人，我之外没有第二个人会听到这卷录音带。”说这些话的目的很明确，如果受访者认为我们的谈话和谈话之后的文章发表会给他的生活带来麻烦，那么我们从一开始就可以不进入。我非常庆幸，我是一个幸运的记者，我的受访者从没有一个人在这样的時候拒绝我。相反，他们告诉我，在来找我之前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因为“这样的谈话对我自己的过去和未来都是一个交待”（引自一位受访者）。

我真的是一名幸运的记者，因为我有可能在那么多原本根本没有机会相识的人的叙述里经历种种别样的人生；有可能和那么多原本即使相遇也仅仅是陌路的人一起静静地坐下来，听他（她）的那些从来尝试对人讲出的心里话，跟随他（她）走进那个埋藏在心里的最隐蔽的地方；有可能与那么多被一些暂时或者侥幸没有遭遇不幸的人视为“不正常”的寂寞、畸零也不乏善良的人交流一些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而又往往被看作不可言说的隐私话题。

我一直认为，隐私是一个十分中性的词。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隐私仅仅是用于定义那些存在于内心深处、不愿意与人分享的人生经历或者感受，并不带有任何有关是非善恶的所谓价值判断。在作为一个正直的人所应具有的爱憎分明之外，我也希望自己是一个宽厚待人、慈悲为怀的人，也愿意相信和认为，一个人在感情上所作出的任何一种抉择都有他必须如此的理由，这是我面对每一位受访者时的最基本的原则，同时也是我和受访者之间相互信任的前提。

隐私，越多的人心理上的负担也就越重，只有当隐私不再成为隐私并且在一个理解和谅解的大前提之下得到放松，才有可能带来某种意义上的解脱。我的受访者无一例外地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来接受我的采访的。我们常常是在一个没有任何干扰的、两个人的环境里对话，方式非常简单：他（她）说，我听。通常他们会很快进入自己的状态，重新在已经以回忆的形式经历过无数次的故事中找到最初的感觉，在这种感觉中重复并且加深曾经有过的感悟和思考，在我的默默无语之中把所有这一切呈现给我。通常，在叙述接近结束的时候他们会期待我的加入，希望我能够有可能讲出一个旁观者的感受。从一双双孤寂而又热烈的眼睛里，我可以读到相同的愿望——希望自己的行为 and 思想能够被一个已经为社会人群所认同的人的认同。我的职业使他们认为我是一个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公众意识的人。我的不带一丝价值判断而又饱含同情和真诚的倾听原则，使他们认为我不会对他们构成伤害。曾经有受访者说我是在担当一个牧师的角色。被一个上帝已经接纳的人所接纳，难道不能理解为自己已经被上帝接纳了吗？听着这样的话，感动是由衷的，但同时我也非常清楚：我，这个坐在你面前静静听你讲述的女人，仅仅是一名很普通的记者，而我所能做的仅仅是用真实的记录和坦诚的关怀给你一点点安慰。

我的职业使我对语言表达的作用十分相信和热爱。我始终认为人与人之间没有什么是不可以通过语言沟通来达成一致，至少是求同存异的。因此我选择，最古老也是最直接的方式——对话——来进行采访。最初非常艰难。我发现要让那些受到伤害的人讲讲自己非常困难，创痛使他们学会了更加严实地包裹自己，往往基于信任而最终导致的被欺侮、被遗弃和被嘲弄使他们走向一个怀疑一切的极端，而我的试探性的提问给他们的感觉首先不是关心而是猎奇。最初的一个人我几乎很难从不相识的人中找到受访者，而认识的人当中的这一部分人总是躲躲闪闪。我甚至想，也许我做的这项工作真的是不合时宜的，没有人会愿意把自己心头的伤痕裸露给一个陌生女人，因此我所期待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注定永远只能是表面的，生命中的疼痛和重负注定永远只能由一个人来承担。然而一个月之后，情况发生，截然相反的变化：开始不

断地有电话找我，开始有一些素昧平生的男男女女要求面对我一吐为快。他们给了我信心和希望。他们使我意识到，我所做的这项微不足道的工作其实是很必要的；同时也告诉我，在这个喧闹的社会里，还有那么多无助的、善良的人，当他们没有能力改变过去的时候，他们还可以通过这样一种倾谈来暂时缓解心中的郁闷，还可以用这样的方式令自己有勇气面对未来。

当我的受访者擦干眼泪、转身离去的时候，也许已经不能完全记得自己讲过的话，但是当他们看到我的访谈录和接到由我转来的一些读者的信件的时候，他们才突然发现原来自己的表达能力是如此之好，原来在同一片广阔的天空下还有那么多可以引为朋友的人。“口述实录”带给他们的除了一种心灵的放松之外，还有对自己的、从未有过的信心。当我在电脑前面一字一句地整理录音带的时候，我的心情非常复杂。键盘的每一声敲击都仿佛是一个人的语音在回响，回响在一个对于群体非常之小、对于个体又无比巨大的空间之中。我几乎不忍删减，因为只有尽可能完整、真实地再现我们对话的场景和讲述者的精神面貌，才能准确、连贯地表达那些几乎永远没有机会表达的一切。声音在转变成为文字的时候犹如一位待嫁的新娘。

在这本书的采访和写作过程中，有很多次、有很多人问我：这不是一本社会学著作？是否是在明确的理论指导下完成一项取证的工作？我不这样认为。也许我的受访者所提供的自身经历和心理历程中所表现的内容在某种程度上暗合了某种理论，但是如果用这些去作为某种论点的事实支撑是绝对不恰当的。我做这些凭的是我作为一名记者的职业感觉及对社会和组成社会的个体的朴素的责任感。我从来没有希望也没有要求自己去成就或者补充某一种理论。我更愿意做的，是在我们社会的大文革、大转折时期忠实地记录某一独特人群的独特历史。

通过“口述实录”的采访，我得到的友情比在28年的生命里程中所获得的还要多出很多很多。他们是我的受访者、我的读者和我的同行以及那些用别人的生命历练来整理自己的过去并且重新上路的人们。他们使我时时都在感觉着：当一个人和他所做的一件事被更多的人需要时，他得到的无以言表的快乐。

感谢我的每一位受访者的信任和真诚，没有他们，就不会有这本书；感谢我所供职的《北京青年报》和所有关注我的工作和这本书的朋友及家人。

此时此刻，我和我的受访者面对着更多的人，就在这里。

1998年4月4日



## 那个反复出现的“你”究竟指的是谁



你  
是  
我  
心  
底  
深  
刻  
的  
烙  
印

采访时间：1997年3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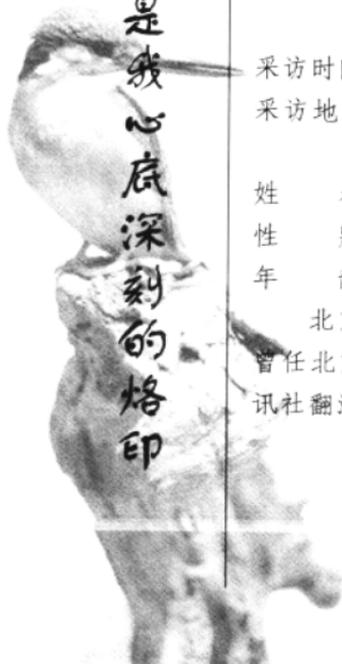
采访地点：北京三里屯某居民楼，慧娟家。

姓名：慧娟

性别：女

年龄：32岁

北京某大学中文专业本科毕业，曾任北京某报记者、编辑，某海外通讯社翻译、记者，现居美国旧金山。



我的身体从一个男人流浪到另一个男人——一种具体的婚姻和一种具体的幸福我后来再也没有得到过——我的骨子里并不是一个很本分的女人——大概这种黑暗就意味着我和他永远不会有光明——对着大铁门我说“对不起”——我和我自己开了这么大的一个玩笑

与慧娟重逢是在1997年1月一个西班牙画家的画展上，我一眼就认出了和一个金发小伙子窃窃私语的她。尽管她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长发披肩的秀气女孩，成熟女人的韵味却依然令她显得十分出众。她递过来的名片上一个中国字也没有，现在她是一家海外通讯社驻北京的记者，名字是Julia。

我还是称呼她“娟姐”。她的笑容依旧灿烂，其中多少有一种历经沧桑的凄凉况味：“6年的时间，我以为再也不会有人能认出我了。”的确，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6年，我们上一次见面是在她的婚礼上，而现在，她至少应该是一个孩子的母亲。于是我自然地问候她的丈夫、那个曾经见过的非常温和的男人。她握住我的手说：“两年前我们离婚了。”在我探寻的目光落在她脸上的时候她微微一笑：“你别问我为什么。”

我们相约了要一叙旧情之后她转身离去，步出展览大厅时，那个一直不离她左右的外国人搂住了她的肩膀。

慧娟在3月的一个好天气里神清气爽地坐在我的面前。她说她从来没有对人说起过她从慧娟变成Julia、从一个平凡体贴的男人的妻子变成一个小政客的隐秘情人又变成一个外国同行的同居伙伴这一系列变迁，她把这一切叫做“流浪”。“我的身体从一个男人流浪到另一个男人，我的心从无忧无虑流浪到痛苦不堪又到充满功利和所谓现实，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人们所说的成熟。”她说。

慧娟曾经是写散文的高手，她的叙述语言使我如临其境，而她的表情平静如一。

1991年是我大学毕业的第二年，我嫁的男人是我的初恋，他叫林枫。那年我25岁，在一家行业报做记者、编辑。他比我大4岁，在外

贸公司工作。我们应该算那种比较典型的流行组合：丈夫收入高，妻子的工作体面、清闲。那时候我没有生活负担。现在想起来我混到今天也是自作自受。

林枫经常出差，他大概是觉得我太寂寞，每次都带一个小礼物回来作为补偿。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写散文的，也是为了把下班后的时间填满。那种心态下写的东西很像日记，都是为了他一个人或者就是为了我们的婚姻，所以非常自我，就是你所说的那种自恋的文字。

慧娟笑的时候头微微向后仰，眼睛半闭着，这是我们重逢以来我逐渐适应的、她的比较“外国”的一种新表情，似乎举重若轻。

我总是把那个本子放在他的枕头边上，有时候他出差回来正好我在报社值班，他一看见那个本子，就知道我在欢迎他回家。

其实我的文章能发表全是因为他。我也不知道他是在什么时间替我誊写了每一篇，然后又寄给那些报纸和杂志。后来我莫名其妙地收到稿费，他才把他收集的样报拿出来。我们的第一个结婚纪念日，他送给我的礼物是一本剪报，全是我在各处发表的文章。他说我每发表一篇他就给我存500块钱，等有朝一日凑足20万字，就自费出一本书，他说那是我们两个人的书。

我们过了两年多安逸日子，那应该是我生命中最宁静的一段时间，一桩具体的婚姻和一种具体的幸福。我后来再也没有得到过。

改变我的命运的还是男人，一个……怎么说呢？现在可以算是政客吧，那时候他还正在往上爬。

我不知道坚强的女人是不是在回忆自己不太坚强的岁月时都会有自我解嘲的表情，或者只有用这样的表情对待过去不成功的日子才能够显示坚强。慧娟的样子有点像电影里那种充满表演气息的所谓“女强人”。

1993年的冬天特别冷，我记得我一直穿着林枫送给我的皮大衣。那天是个阴天，黄昏的时候我已经在看校样了。总编打电话让我去他的办公室。我在那儿第一次见到了丁力，他是主管我们的宣传部长。总编说他是亲自来看要闻版的。我当时就觉得很可笑，这么一张黑板报似的小报纸也值得他这样，差不多就得了。我不以为然，所以点点头就把大样递给他。他没接，很客气地给我让座。他身上有一种和蔼的亲和力，可能

正在往上爬的人都会让自己有这么一股劲儿吧。可是当时我还是挺受感染的。他给我指出标题怎么做、文字怎样删减才更精炼，说得都挺对，我随手在一本稿纸上记下来。当我抬头看他的时候，我发现他的牙齿很白，眉毛很浓重，看上去大约三十八九岁的样子。

要闻版经过他的修改的确是变得有些好看了。那段时间林枫也是在外而出差。我是每个星期四值班，要闻版是最后一个签字付印的版面，所以我永远是最后一个离开报社的人。假如林枫不出差，他就会来报社接我下班。我们有一辆红色的小车，一直是他开着。照理说我的日子过得已经很好了，在那时候的北京我们算得上是中产阶级。我也不明白为什么那样的生活还不能让我安分下来，惟一的解释只能是我 and 林枫没有白头到老的缘分。

尽管慧娟的淡然流露于叙述的每一分钟，但是她对于第一次离婚的后悔还是随处可见。当然她不承认自己后悔。

我们的工作量就是由于丁力的精益求精而在无形中加大的，但是不能不说他是一个很称职的领导。他说话幽默、思维敏捷，同事们都非常接纳他，而且自觉地身体力行他的一些要求和点子。慢慢地我们知道他39岁，在南方读的大学，学新闻出身。仅此而已，我真的没有别的想法。

那天还是我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林枫去马来西亚出差，没有人来接我。我站在报社门外的小马路边上等出租车。这时候有一辆蓝色的丰田车停在我面前，是丁力。他说天太晚了，他可以送我回家。他是自己开车的，因为“不想拖累司机跟他一样没有早晚”。他开车的动作很熟练，甚至可以说是漂亮。我喜欢看男人开车，对林枫也是一样，每次我这么说的时他就全把我们的小车开得飞起来。丁力让我带路，一边跟我说话。他居然看过我的一些散文，而且很调侃地称之为“小女人散文”，还说小女人是特指那些有钱、有闲而且感情精致细腻的现代女性，说那是一个新生阶层。我解释说像我这样这么晚了才下班的女人，再精致的感情也被钝化了。我们一起笑。当时我觉得这个人还不算是被磨得没有了棱角的那种小官僚。

慧娟摇摇头。

当然，后来的情况证明我的感觉是不准确的。我们在我家的楼底下

分手，他走的时候说的最后一句话是：“那些散文挺好的，非常纯粹，我很喜欢。”

后来的星期四，到了傍晚还不见丁力来报社，总编让我叫他，因为只剩下我这一个版没有签字。他回电话说开会不来了。那天我大约8点钟离开报社。在大门口，蓝色的丰田车停在路边。丁力的样子很疲倦，左手扶在方向盘上，夹着半支烟。我以为他是赶来看大样的，就等他跟我重回办公室。他让我上车；然后说：“我来送你回家。”

慧娟停下来，走到厨房为自己添了一些热水。我知道她已经讲到了紧要处，也许她需要平静一下或者选择一种比较不容易激动的表达方式。我觉得她的这种自觉的切断叙述非常不同于普通的渴望倾诉的中国女人。大概这就是她每天浸染其中的所谓异域文化吧。

我不是傻瓜。这种时候再迟钝的女人也明白，什么都不用说了。回家的路一点一点缩短，我有点儿发慌。现在想一想，可能当时我也是希望着能够发生什么的，我觉得我的骨子里并不是一个很本分的女人，也可以说是不甘心就那么本分地生活吧。他拧开收音机，我记得非常清楚，主持人念了一大串人名之后就是张信哲唱的《爱如潮水》。二环路上的灯光是昏黄的，我的耳朵里反反复复就是那两句歌词：“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这些年我常常在想，其实有时候人是会自己设计一种命运，然后有意识地按照那种设计去实践，我就是这种人。当时那样的环境和气氛其实是我们人为地计划好了的，没事才怪呢。

我的命运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我自己亲手改写了的。车停在路边，他不动，静静地抽烟。我说我要走的时候他一把抓住我的手，实际上应该是我们彼此抓住了对方，可能我比他还用力。我把什么都忘了，我自己是谁、谁是林枫、这个人是谁、我以后还要不要跟他共事……全忘了。我们俩摸着黑上楼、开门，然后在黑暗里做爱。所有的事都是在黑暗中完成的，大概这种黑暗就意味着我和他注定永远不会有光明。

穿好衣服坐在沙发上，我发现我从此再也不敢看他了。我的家里到处都是我和林枫一起生活的痕迹：墙上挂着我们的结婚照、枕头边上是那个我写东西的小本，仅仅10分钟的时间，我就把这些全都打碎了。我再也没脸说自己纯洁，而且这个才认识了这么短时间的我的领导变成

了我心里的秘密和隐痛……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有类似经历的女人都会哭，反正我哭得很伤心。丁力抱着我，我听见他说：“我要你做我的小女人。”

慧娟拿起我的茶杯走进厨房，回来的时候，态度放松了很多。

林枫是在星期六回来的。在这之前我把家里做了一个彻底的大扫除，床单、枕头套和被罩全部换成新的，但是没用，我换不掉那种尴尬和愧疚。林枫一进门就抱住我说他每次回家必说的话：“老婆我真想你。”我听着心里特别不舒服。林枫一点是错误也没有，他一心一意地爱我，几乎可以说是天真无邪。我想不明白我是不是也爱他，但是他是我丈夫这种事实是明明白白的。

丁力没有任何变化。从这一点上我也看出了男人与女人的不同。女人要是在恋爱，从她的表情和行为上都会有一些蛛丝马迹，但是男人就可以掩饰得特别好，就好比晚上的嫖客可以在早晨摇身一变成社会名流。他还是到报社来，跟大家嘻嘻哈哈。他有时候会问我一些一语双关的话，我也用同样的方式回答。一想到只有我们俩能听懂，我还有点得意。有一个星期四，林枫在报社门口等我下班，我坐在车里的时候，忽然从前风档看到丁力就站在他的车旁边，而且正在看着我。他的眼光有些凄凉和局促，我们几乎就是从他和他的车旁边擦过去的。林枫好像根本没看见他，他就是这样，只要和我在一起，他就什么也看不见，后来我知道这个感觉也不对。但是丁力的表情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恐怕我后来的所有决定都跟他的那种眼光有关。

林枫的工作在这个时候有了变化，公司派他到泰国常驻，一年以后可以带夫人。丁力从那天晚上之后就一直没来报社。关于他的传说很多，大部分都是说他马上要做一个主管局的局长了。

1994年4月的时候他又出现了，那时候我是人们说的那种“留守女士”。他比原来瘦了一点儿，照样谈笑风生。那天他又送我回家了。上他的车的一刹那，我真的很绝望，为林枫和我。车还是停在老地方，他马上转过身来吻我，我还是哭。他提起了那天在报社门口：“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疼痛。”就在这个时候我决定离开林枫，我想拥有一份纯粹的爱情，也想还给林枫一份完整的、没有欺骗和隐瞒的生活。谁知